

自然与文化的对立统一 ——谈生态符号学研究的理论核心*

胡壮麟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北京 100871)

摘要: 自19世纪中叶生态学研究获得巨大发展后,生态危机的概念不仅影响到归属自然科学的生物学、动物学和植物学等学科的研究,也通过隐喻的概念,延伸到人类学、文学、符号学、语言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学科。本文重点介绍生态学与符号学的结合(生态符号学或符号生态学)的简要过程,不同理论和学派的侧重点,包括塔尔图——莫斯科学派,Sebeok的动物符号学模式,Nöth的宇宙整体观,Uexküll的客观环境论,Kull的主体人类生态学,Deely的生物中心主义,Hoffmeyer的文化、内部自然和外部自然的三维观。作者认为,生态符号学研究的理论核心实际上是从自然与文化的对立统一关系的视角,探讨符号的起源、作用和演变。

关键词: 生态符号学; 自然与文化; 客观环境论; 人类符号学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242(2014)04-0001-05

1. 引言

始自19世纪中叶,著名德国生物学家、哲学家、物理学家和艺术家 Ernst Haeckel (1834—1919) 提出“生态学”(ecology)的学科概念,一门在生物学科下研究有机体和环境的外部世界之间关系的分支。虽然当代生物学家至今仍然接受这个定义,但对如何解释“环境”这个概念一直存在着激烈争论,有的同意“外部世界”是“有关生命和有机体发育的所有外部(生物的和非生物的)条件和影响的总和”(Platt 1980: 265);有的认为不能把生物体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对立,有机体同时具有外部和内部这两种环境(Geist 1978: 18)。后一观点日后导致生物符号学的产生,而有关环境的讨论实际上是对“自然”及其作用不同认识的交流。

尽管生态学是生物学的一个分支,归属自然科学,自从出现世界范围的“生态危机”后,许多学科,如动物学、人类学、文学、语言学、符号学、教育学等开始关注生态学的研究,并力图将生态学的成果应用于本学科,从而产生巨大的超学科影响。生态学与符号学的结合便是一例。

本文所谈的“生态符号学”(ecological semiotics, ecosemiotics)目前尚无统一的、权威的定义。由于分布于不同学科的学者就生态学与符号学的结合有不同的理解、选择了不同的切入点、对研究课题有不同要求,以至对有关生态符号学的研究曾常以其他分支学科的命名出现(如符号生态学、生物符号学、动物符号学、人类符号学、内部符号学等),难以统一。本文先举几个定义作为

参考,留待读者逐步深入,进行思辨和比较:

——“生态符号学研究有机体和它们所处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Nöth 1998)

——“生态符号学可定义为自然与文化相互关系的符号学。”(Kull 1998)

——“生态符号学是一个与人类生态学交叉的符号学分支,研究经由文化确定的符号关系,即处理人类生态学与其他生物,群体和地貌的相互关系。”(Wikipedia 2013)

下面就生态符号学发展的几个主要阶段,代表人物和主要观点做一简单介绍。

2. 塔尔图——莫斯科学派

将生态学概念应用于符号学研究,最早在塔尔图——莫斯科学派1983年的论文集中出现。由于该符号学派是在欧洲符号学传统上发展起来的,把文学和文化看做是符号学的主要研究方面。因此这个学派关注的是文化及其与外部事物之间的区别,认为文化与自然两者是对立的关系,并对物质环境的描写采用结构主义方法(Sonesson 2000)。该学派的另一个主要概念是把原先界定为书面形式或先行结构的text(文本)的意义扩展到生态学研究,指自然环境中的某些情景。这样,“文本”成了文化的载体,被赋予特殊意义和功能,因而具有属于客观层次和物质的概念(Ivanov 1998: 65)。举例说,像民族服装、音乐和绘画作品,只要它们在文化中被使用被知晓,便可认为是具有价值的“文本”。同理,自然环境的某些情景也可视为“文本”,如一个校园的景色。同时,该学派认为凡是文化

* 本文于2014年6月28日在天津外国语大学召开的第11届语言与符号学会议上宣读。

现象不需要解码或本身具有可以解码的特性,一样可以获得文本的资格。这里有必要提一下英国巴斯大学 Andrew Stables 的观点。Stables(1997)注意到在地貌中,共享意义的网络超越出了人类域,因而很难区别人类,其他生物和自然力量之间的创造活动。就这个观点而言,自然环境可以理解为是不同物种共同创造性活动的结果,是不同生物物种从各自的符号系统,客观环境和日常生活“书写”而成的。例如,蚯蚓或河狸都可以是改变地貌的“作者”,并对其他物种,包括人类,产生影响。在此情况下,不同生物在环境中都有活动,但又难以区别不同物种各自的作用。

3. Sebeok 的动物符号学模式

与上述观点不同,美国符号学家和语言学家 Thomas A. Sebeok 提出动物符号学的模式。他不同意把人类语言作为首要的模式系统,也不同意把复杂的文化现象(文学,艺术,音乐,神话,宗教等)看做是自然语言衍生的第二性模式系统。Sebeok(1988:73,74)认为在本体发生和系统发生之前应该先有另一个模式系统,即被观察到的世界。这里,符号是通过物种特有的感觉器官和神经系统进行区别的,与物种的行为资源和神经系统相一致。

按照 Sebeok 的看法,人类具有两个互相支持的模式系统,一个是人类特有的作为人类符号的语言,一个是作为动物符号的语言。后者不易为人类察觉,因为人类的动物符号系统生而有之,后来又在很大程度上被常规意义系统覆盖了。正是这个原因,语言资源往往存在不能充分描写非语言交流的现象。总之,人类是具有两个层次的生物:作为生物学的有机体,人类通过听视觉、味觉、嗅觉、触觉、身体活动和所有相应的感受,与其他生物和自然环境交流;作为高层次的文化生物或有智力的生物,人类具有言语和文字的能力,得以发现和描写上述感觉,并进行传递和评价。因此利用这些即时环境经验有关的自然文本,是研究这些类似的动物符号痕迹的最合适的材料。动物符号学的非言语模式使人类和动物之间的交流得以实现(Sebeok 1990)。

4. Nöth 的宇宙整体观

生态符号学的名称由德国卡塞尔大学的 Windred Nöth 1996 年在墨西哥瓜达拉哈拉召开的第 6 届国际符号学大会上首次使用(Kull 1998:347)。

Nöth (1998) 认为索绪尔持有符号学观点,却没有任何生态符号学的视角。按照索绪尔的观点,人类知识都要经过语言的过滤和沉淀。

在语言出现以前,人类认知环境中没有一样是清楚的,甚至自己的思想,任何事物都是乱麻一团,这是没有语言的形成方式所致 (Saussure 1916: 111-112)。这样以语言为中心的符号生成研究计划,势必阻碍对有机体及其周围环境中符号生成互动过程的生态决定因素进行研究,因为这些领域未为生物符号学和人类符号学所关注 (Nöth 1994a)。

对比之下,Nöth 肯定美国学者皮尔斯的观点,“整个宇宙充满着符号,即使它不是完全由符号组成的。”(Peirce 1958: 5488)皮尔斯认为,只有当有机体及其环境之间存在着三维关系才具有符号性。这时,有机体在环境中所经验的不仅仅是事实,而是经由第三方进行解释,这第三方就是意义、目的、目标或法则,它们贯穿于直接环境下的情景中。符号生成的三维关系是认知过程,以目标为导向的行为,以至思维活动的特征 (Nöth 1994b,c)。在这个意义上,符号生成不局限于高级有机体,文化和社会常规。任何初级有机体为了存活都对周围的物体进行选择或回避,这表明它与环境进行了符号的互动。除皮尔斯外,Nöth (1998:338)也谈到美国学者 Charles Morris 的行为符号学,他将符号研究的领域从人类符号生成扩展到研究有生命有机体的符号生成和接受,强调有必要超过符号的结构和意义层面进入到符号生成的实用层面(Morris 1971:366)。

总的来说,Nöth 在生态符号学研究中,侧重有机体和它们周围环境之间的符号关系。以当代生态哲学来说,Nöth 接受了宇宙的整体观。

5. Uexkül 的客观环境论

在生态符号学中,对 Nöth 影响较大的是德国生物学家 Jakob von Uexküll。Uexkül (1928, 1940)最早系统地研究有机体和环境之间关系的符号本质。Uexkül 以“客观环境”(Umwelt)一词代替了 Haeckel 的“外部世界”,但这是一种主体的客观环境,涉及有机体与环境实际互动时的观察和特定的操作世界。由于有机体包括不同物种,它们对环境的要求、能力和视角也呈现不同,从而有各种各样的客观环境。为此,Uexkül (1980: 335)认为:“不管我们从动物系列中选择哪一个主体,我们总能发现在其周围构建着另一个客观环境。由于每一个主体是它自己客观世界的构建者,客观环境处处散发其痕迹。”早在 1928 年 Uexkül 便提出,这个客观环境的意义和符号绝不是从外在的环境传递到有机体的内部。反之,客观环境和有机体内部之间有互补性的关系。这

样,客观环境和内部世界构成“解释循环”^①,因为有机体的内部世界含有客观环境的认知模型,由此我们可以认为有机体不仅是一个环境的接受者,而且是自己环境的构建者。客观环境的环境意义理论已成为符号学的经典理论之一,成为生物符号学的理论基础。有关有机体——环境关系现已从微观生物学和宏观生物学两个方面进行研究。可见对环境符号的研究不限于有机体内部世界(innerwelt)及其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而是除了与外部客观环境有关的符号生成外,还存在有机体内部的内部客观环境的符号学。Sebeok(1991)把它称之为“内部符号学”(endosemiotics)。这样,在有机体内部的符号生成层面上的生态符号学从对分子生物学环境中的基因,其他基因和反基因之间的认知和识别过程便已开始,它们具有互补关系。在生态学的符号生成的层面上,可以找到二元对立的根源,即它在较高和最高层面的符号生成中组成结构和系统(Nöth 1994a)。

6. Kull 的主体人类生态学

塔尔图大学符号学系主任 Kalevi Kull(1998)是继 Nöth 之后的第二个正式使用“生态符号学”名称的学者。在继承和发展塔尔图学派理论的基础上,他有关生态符号学的定义与 Nöth 有三点不同。(1)Kull 认为 Nöth(1998)对生物符号学和生态符号学两者区分不清,他也不能区分与 Uexküll 的客观环境概念的异同。因此,Nöth 的生态符号学包括所有有机体——环境相互关系的所有符号方面,即 Nöth 所谓的有机体包括人类和非人类,或被认为是“内部符号学”(endosemiotics)的内容。(2)Nöth 把环境也看作是有机体内的内容(intraorganismic)。这样,生态符号学成为生物符号学的同义词。(3)Kull 认为生态符号学的重要性在于实际应用,因此他强调主体的人类生态学。这里他接受了 Uexküll 所阐述的“意义”,即将人类生态学的研究延伸至符号学,或从符号学视角研究人类生态学。

基于这些认识,Kull 把生态符号学定义为研究自然和文化之间关系的符号学,研究自然对人类的地位和作用的符号学方面,即自然对人类具有的意义和人类与自然交流的方式和程度。生态符号学便是处理人及其生态系统之间所进行的符号生成过程。为此,生态符号学与人——自然关系中的民俗学和社会学有关,也与环境心理学和环境人类学有关。当然,这些学科关注相互之间的比较更甚于符号学问题。因此生态符号学可看作是有关文化的符号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研究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具有符号生成的基础。进一步而言,生态符号学描写有赖于不同情境或情景的自然现象,如自然所显露的结构和分类(结构学),自然对人类的意义和具体内容(意义学)。生态符号学也试图发现人和社会与自然各成分的关系,即人在自然中的参与(实用学)。所有这些都存在“记忆”的作用,和文化中不同类型(短期,长期等)记忆之间的关系。为了考虑有关演变方面的内容,生态符号学也可延伸至非人类系统。就人——自然关系的符号学方面而言,它关心对自然评价的情境依赖性,观察自然和理解自然的种种差异;它也关心文化中人的行为的符号特征,如在深林中居住或在林地行走的行为,这些行为在看电视、阅读、谈话或梦中的表现。因此,它必然关系到自然的形成,人类语言的应用、美学等方式对环境进行设计和构建(Kull 1998: 350—351)。

在自然与文化关系的研究中,Kull(1998:355)对“客观环境”有不同的看法。Uexküll 对客观环境的概念强调的是每一个有机体都有其自己的环境,不同于他者;Kull 强调的是在客观环境中,特别是人类客观环境或符号域中,自然不是独特的观点。在此以前,学术界,包括 Hecker, 已把自然区分为第一自然和第二自然,但 Kull 进一步提出,自然就其客观环境而言,可区分为 4 类:

— 零自然:自然本身(如纯粹意义上的荒野),完全客观存在的自然,自生自灭的自然。

— 第一自然:人们见到的、确定的、描写的和解释的自然,通过人们的语言和符号指认的自然。

— 第二自然:人们从物体上能加以解释,进行操作并导致变化的自然。自然通过人的参与而发生变化。犹如将零度自然翻译到我们知识中,第二自然是我们对自然的意象,不管是神话的、社会的或科学的。

— 第三自然:虚拟的自然(存在于艺术品或科学中),自然意象的意象。对这类自然的理解需要解释再解释,翻译再翻译。

零自然通过本体的符号生成发生变化。第一自然是通过人类符号生成过滤的自然,经我们的社会知识和个人知识获得解释,这是范畴化的自然。第二自然是通过物质过程而变化的自然,是真正经过符号翻译的形式。第三自然完全是理论上的,意象的或艺术的自然,经由第二自然的作用而成。

Kull 进一步认为,在人类客观世界发展过程中,符号域和生物域的零自然和第一自然逐渐消失,但第二自然不能建立在空域中。它的构成意味着人们将某种模式,或某种普通语言学的范式

套在自然上,如一个花园的设计,要考虑花草、灌木、树木等的组合。这四种自然存在着逻辑关系,通过简单的结合,表示自然与意象之间的“创新”过程。零自然是从自然到自然,第一自然是来自自然的意象,第二自然是从意象到自然,第三自然是从意象到意象。不同概念的自然可以用下图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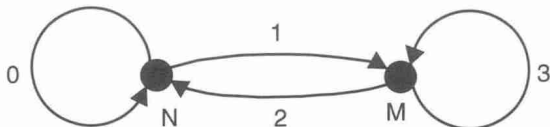


图1: 四种自然的生成过程(N=自然, M=意象)

所有这四种自然都参与自然科学的日常话语。零自然是生物学家试图描写的,第一自然是他们所观察到的和描写的,第二自然存在于他们的实验室中,第三自然是他们在论文中和模式中提到的。总的来说,自然是一个各种过程的复合体,不仅仅是一个范式。换言之,从零度到第三自然可认为是用来区别发生的,描写的,实验的(技术的)和理论的不同科学步骤(类型)。因此,处于自然中的人类社团不可能是荒野中的社团。与自然一起生活最终意味着对自然的改变。例如,英国今天种植的树木有90%不是土生土长的植物,芬兰的树林不是原生的,而是人工种植的。

7. Deely 的生物中心主义

美国符号学家 J. Deely (1990: 7) 认为,就自主性而言,人类文化领域只能做到相对的自主;就传承性而言,人类文化领域只能结合和依赖生物符号生成(biosemosis)。这是一个互相依赖的更大框架中所有形式的有生命物共享的物质环境。对这个更大整体的了解界定了作为其组成部分的文化符号学的全部任务。这表明 Deely 突出的是文化符号学的研究。

Deely 还认为生态学可视为一个庞大的研究课题,旨在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二分化,表示和解释人类社会如何实际上只是生态系统的一个成分。在生态循环中人类是其他消费者之间的一个消费者。这个生态循环包括所有植物、动物、微生物和地球。作为生态研究中一个方面,生物中心主义(biocentrism)的出现是为了替代物质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可见,符号学与生态研究相似,为了摆脱思维与物质的分裂,应当强调其互相作用,即两者都属于符号域(semiosphere)。

8. Hoffmeyer 的文化——自然三维观

与 Kull 的四分法不同,在讨论文化与自然关系时,丹麦哥本哈根大学 J. Hoffmeyer (1996: 96) 把自然区分为内部自然和外部自然两类,从而绘制了一个包括文化,外部自然和内部自然的三角

关系。文化与内部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心理符号学领域,内部自然和外部自然之间的关系是生物符号学领域,而文化和外部自然之间的关系为环境域(environmental sphere)或生态符号学的领域(Kull 1998: 350)。如下图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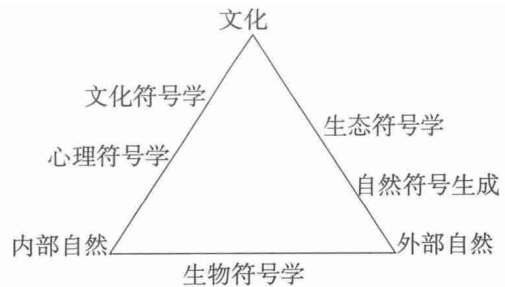


图2: 文化——自然关系的三维观

按照 Hoffmeyer 的解释,生物符号学把有生命系统作为符号系统进行分析,其目的是研究符号的起源,调查有生命物的符号生成,因此它研究的范围比人类要广要远,超越有思维、有意识的生命,因而符号的起始点接近生命的起源。

Hoffmeyer (1996: 32) 对生物交流区分垂直轴和水平轴。垂直轴相当于家谱学方面的符号生成,水平轴相当于生态学方面的符号生成。这与生物符号学的历时和共时有关。生态符号学属于共时,但 Hoffmeyer 认为生态符号学也要研究文化——自然关系的历时过程,即自然在文化过程中的发展。因此,生态学研究的引入比单纯生物学的研究更进了一步。这是因为生态符号学对自然的描写依赖于不同的情境和情景。

Hoffmeyer 还认为生命充满着符号化,并由符号生成过程界定。单靠生态学不能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他强调说:“如果生态学将世界继续分裂成两个明显的部分:自然的和文化的,在处理自然关系时生态学便很难成为我们的向导和导师。其结果是它维护所有情感的上层结构,所有的幻想,它使我们与自然分离。”(Hoffmeyer 1996: 143) 如果这样做,生态符号学的研究将是各搞各的。总之,世界不能仅仅切分成互不相干的自然和文化两部分,应当探讨两者的互补关系。正是这个原因,符号化过程使有机体彼此联系,超越了自然科学。在生态符号学或符号生态学中,符号化过程是那些使有机体生存与有生命的有机体本身相互关联。这意味着学术界引入了一种超于自然科学极限的观点(Kull 1998: 362)。符号生态学是延伸的生态学,在哲学和方法学方面产生了变化,它不再是自然科学。同样,符号学成为延伸的生物学,现有的生物学只是一个特殊限定的例子。接受这个观点意味着我们把 Uexküll 的客观环境的

概念的理解比它在自然科学中的意义要宽广得多。

9. 结束语

就以上介绍的几种主要流派的理论和观点,不难看出生态符号学或符号生态学的学科内涵主要是研究自然与文化的区别与结合,尽管各有侧重。生态学强调自然因素,符号学强调文化因素。所谓自然,它涉及客观世界,有机体和环境情景,那是生物符号学和动物符号学的任务;所谓文化,它强调人类,社团和认知,那是人类符号学和文化符号学的任务。这是两者对立的一面。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没有自然,符号对我们没有存在价值;没有文化,我们对自然的认识难以突破和提高,我们充其量只能停留在喜爱零自然和第一自然的认识水平,难以提高到第二自然和第三自然的境地,也就是记载我们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活动和经验,从事生产活动和科学研究,进行艺术创作。

不论是自然还是文化,都离不开客观世界。人类不同于其他生物体或有机体,人类既是客观世界的生物体的组成部分,又能通过自己的感觉和认知活动,有智慧地利用符号工具,观察、描写、交流、分析、研究客观世界。

由于篇幅关系,本文尚未涉及所有关于生态符号学的理论和活动,特别是系统功能语言学派 Thibault 在从 Lemke 的社会符号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生态社会符号学,也未能就生态符号学发展过程中所涉及的主要问题,如可持续性、视角、交流、情境、语言、应用等进行讨论和分析。欢迎感兴趣的学者关注这方面的研究进展。

注释:

① 解释循环(hermeneutic circle),指通过反复解释理解一个文本,既从整体意义了解其部分意义,也从局部意义了解其整体意义。解释循环强调文本意义存在于文化的,历史的和语言的情境中(Wikipedia 2014)。

参考文献:

- [1] Deely, J. 1990. *Basics of Semiotics* [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2] Geist, V. 1978. *Life Strategies, Human Evolution, Environmental Design* [M]. New York: Springer.
- [3] Haeckel, E. 1866/1988. *Generelle Morphologie des Organismus Bd. 2: Allgemeine Entwicklungsgeschichte* [M]. Reprint. Berlin: de Gruyter.
- [4] Hoffmeyer, J. 1996. *Signs of Meaning in the Universe* [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5] Ivanov, Vyacheslav V. 1998. *Тезисы к семиотическому изучению культуры* [M]. Tartu: Tartu University Press.
- [6] Kull, K. 1998. Semiotic ecology: Different natures in the semiosphere [J]. *Sign Systems Studies*(26): 344-371.
- [7] Morris, C. 1971. *Writings on the General Theory of*

Signs [M].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8] Nöth, W. 1994a. Opposition at the roots of semiosis [C] // W. Nöth. *Origins of Semiosis*.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37-60.
- [9] Nöth, W. 1994b. Semiotic foundations of the cognitive paradigm [J]. *Semiosis* (73): 5-16.
- [10] Nöth, W. 1994c. *Origins of Semiosis* [M].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11] Nöth, W. 1998. Ecosemiotics [J]. *Sign Systems Studies* (26): 332-343.
- [12] Peirce, C. S. 1958. *Collected papers* [C] // C. Hartshorne, P. Weiss & A. W. Burk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3] Platt, R. B. 1980. Environment [C] // S. P. Parker. *McGraw-Hill Encyclopedia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New York: McGraw Hill; 265-268.
- [14] Saussure, Ferdinand de. 1916. *Cours de Linguistique Generale* [M]. Lausanne: Payot.
- [15] Sebeok, T. A. 1988. In what sense is language a "primary modeling system"? [C] // H. Bross, R. Kaufmann. *Semiotics of Culture. Proceedings of the 25th Symposium of the Tartu, Moscow School of Semiotics*. Helsinki: Arator Inc.
- [16] Sebeok, T. A. 1990. "Talking" with animals: Zoosemiotics explained [C] // T. A. Sebeok. *Essays in Zoosemiotics*. Toronto: Toronto Semiotic Circle; Victoria College in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 [17] Sebeok, T. A. 1991. *A Sign is Just a Sign* [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18] Stables, A. 1997. The landscape and the "death of the author" [J]. *Canadian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2(1): 104-113.
- [19] Sonesson, G. 2000. Bridging nature and culture in cultural semiotics [C] // W. A. Gimete. *Miradas desde el cruce de la naturaleza y la cultura. Proceedings of the 6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IASS*. Guadalajara, Mexico, July 13 to 19. Pourrua: 1005-1016.
- [20] Uexküll, J. v. 1928/1973. *Theoretische Biologie* [M]. Frankfurt/Main: Suhrkamp.
- [21] Uexküll, J. v. 1940. *Bedeutungslehre* [M]. Leipzig: Barth.
- [22] Uexküll, J. v. 1980. *Kompositionslehre der Natur* [M]. Frankfurt: Propylaen.
- [23] Wikipedia. 2013. Ecosemiotics. Retrieved from "http://en.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cosemiotics&oldid=546232302" Last modified on 22 March 2013 at 08:51.
- [24] Wikipedia. 2014. Hermeneutic Circle. Retrieved from "http://en.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Hermeneutic_circle&oldid=588760995" Last modified on 2 January 2014.

收稿日期:2014-06-28

作者简介:胡壮麟,教授。研究方向:语言学。

(责任编辑:李德俊)

Abstracts of Major Papers in This Issue

The Unity of Opposites between Nature and Culture: On the Theoretical Orientation of Ecossemiotic Studies by HU Zhuanglin, p. 1

Since the development of semiology beginning from the mid-19th century, the concept of ecological crisis has influenced not only biology, zoology and botany, which belong to natural science, but has also extended, through metaphorisation, to those disciplines such as anthropology, literature, semiotics, linguistics, sociology, pedagogy, etc. This paper mainly deals with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combination of ecology and semiotics—ecological semiotics or semiotic ecology, and the basic notions of various theories and schools, including Tarty-Moscow School, Sebeok's model of zoological semiotics, Nöth's integral view of the universe, Uexküll's contextualism, Kull's subjective anthropological semiotics, Deely's biocentrism, and Hoffmeyer's 3-dimensional view of culture, internal nature and external nature. The present writer holds that the theoretical orientation of ecossemiotics is to explore the origin, function, and evolu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unity of opposites between nature and culture.

Key Words: ecossemiotics, nature and culture, contextualism, anthropological semiotics

A 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on the Research and Teaching of English Literature by ZHAO Wenshu, p. 49

A discipline is a branch of knowledge as well as the teaching of the knowledge. Faculty of the English department in China research literature, linguistics, or translation studies but teach mostly language skills, so there is a mismatch between research and teaching in the field of English as a discipline. This paper looks to the i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nglish studies in America for solutions to the mismatch, in an attempt to find out possible ways to coordinate the research and teaching of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in China. It is proposed that more emphasis should be put on the contemporary and local relevance and the interdisciplinarity of literature in research and that du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training of interpretive skills and the interpenetration of the studies of literature and the acquisition of language skills in pedagogy so that a balance could be achieved between the social needs for the education of students and the disciplinary need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 Words: research and teaching of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English as a discipline;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Investigation of Native English Speakers' Language Preference and Revelations: A Case Study Based on the Yangs' and Lyell's Translations of "Kong Yiji" by WANG Shuhuai & WAN Guangrong, p. 70

The knowledge of English speakers' language preference is the basic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criticism and transl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Using the Yangs' and Lyell's translations of "Kong Yiji" as the object of evaluation, we investigate thirty native English speakers' language preference. The result shows more readers prefer Lyell's translation to the Yangs'. It also reveals: 1. Lexically, readers prefer words of tension to words of plainness, and frequently used meaning to rarely used meaning; 2. Syntactically, when describing a series of actions, readers prefer topic sentence (sometimes introductory sentence) plus parallel description or simply parallel short sentences/verbs to cramming all the actions into one complicated hypotactic sentence; 3. Culturally, readers prefer amplification to word-for-word translation or footnotes; 4. Narratologically, readers prefer creative vividness to literal faithfulness, and readers' hermeneutic space to translator's indeterminacy concretization.

Key Words: language preference; investigation; revelation

***The Red Badge of Courage* and the Myth of the American Hero** by HU Yamin, p. 93

In *The Red Badge of Courage*, Stephen Crane portrays how Henry Fleming grows up to be a "hero". The story seems to follow the formula of the hero's mythological adventure of "separation—initiation—return", proposed by Campbell. But an in-depth study, by measuring Henry's story against Campbell's formula, reveals that Henry's return to the absurd and chaotic society signifies his complete failure as a hero, because he can neither get accustomed to the cultural space in America nor be able to be a loner, thus powerfully deconstructing the myth of the American hero.

Key Words: Stephen Crane; *The Red Badge of Courage*; the myth of the American hero